

2009 後記

-- 為什麼 1996 年我在台灣要寫「性革命」這個主題

活在 1990 年代台灣性革命之後的年輕人，其實很難想像台灣經歷性革命前後的差異；現在人們越來越不把婚前性行為、同居、未婚懷孕、一夜情、女性情慾主動、女性談論情慾等等當作污名，甚至至少在表面上把尊重同性戀或跨性別當作理所當然該做的事情，這些都是台灣性革命之前不可想像的。1994 年卡維波寫〈一場性革命正在發生〉，就是要捕捉解讀當時性革命的跡象與趨勢，但是如何從理論觀點上看待台灣的性革命則是我這篇論文要解決的問題。

我所採取的途徑是從西方性革命的歷史，去解釋性革命的發生、去觀察性革命所累積的政治效應。20 世紀初期像賴希這類活躍的西方性學家，帶動了性改革的社會運動，當時曾被人稱為「性革命」；不過到了 1960-70 年代，西方的婦女解放、同性戀解放運動，以及反文化運動中的 free love，這些被稱為「性解放」的趨勢構成了現在大部分人所知的西方「性革命」，也確實徹底改變了人們對於性的看法。然而許多人對於性革命之所以會發生，並沒有像面對其他社會革命一般，加以歷史的、理論的分析，反而只是像女性主義者 Sheila Jeffreys 那樣，政治性的對性革命採取簡化而負面的批判觀點（*Anticlimax: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UP, 1991）。事實上，認為性革命是「失敗的」、「危險的」、「過時的」等等評價，常常成為輿論慣用的主流說法，在台灣也很流行。我的文章則是

針對這樣簡化的價值評斷，提出縱深橫跨的歷史社會分析，用理論的解釋來說明性革命的發生和效應，用揭露醞釀冒泡中的根本社會矛盾，來激化社會的革命。

我個人因為身在其中而未能充分自覺的歷史鏡射是：其實 1990 年代在台灣與西方，都是性運動全力衝刺的年代。西方酷兒在愛滋危機中越挫越勇，中國大陸的性革命則也是潮流洶湧（參見潘綏銘，《中國性革命縱論》，高雄萬有出版社，2006）；到了 21 世紀，因為網路等傳播科技對於新的性文化之推波助瀾，更根本地改變了全球的性文化，固然同時引發了保守派的歇斯底里立法打壓與反挫，至今仍在拉扯與交鋒中，但是此刻回顧性革命的遺產，已是輕舟已過萬重山，今日人們已經難以否定過去性革命的成果。

我的論文所揭示的「如何看待社會矛盾」的問題，今日依然十分重要，因為「否定性革命」的那種思考邏輯，仍然存在於今日的其他議題中。例如許多看似政治不正確、冒犯大眾與主流的個人突破性實踐，不但被保守者污名入罪，也被政治正確掛帥的性別言論所譴責否定，而忽略了這類實踐可能如何激化社會矛盾。這篇文章想要帶給讀者的啓示也就是：我們需要藉著社會與歷史的分析，來認清如何與為何要把性革命進行到底。